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 6

萬寶全書：
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 6

萬寶全書：
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

獻給 戴玄之教授
(1922-1990)

主編序

富而好禮是儒家思想中較理想的社會型態，只是能體會「有功夫讀書乃生平福分」的好知者，在今天這樣富裕的社會中也未必隨處可見。反之，有這層體會的人，也未必能找到好書，所以學術的道路仍相當寂寞。許多大學因而成立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將校內的研究成果向社會推展。

基於相同的理念，從1996年起，政大歷史系選擇優良的碩、博士論文，出版為「政治大學史學叢書」，給青年學子的優秀作品有發表的機會，也可以讓社會能很快的了解政大學子的研究成果。今年，這套叢書已經要出版第6號了。

富而好禮是一種理想，多讀書是達成這種理想的重要方式。讀書有兩個先決條件：有書可讀，讀得懂書，這牽涉到識字率與印刷技術。印刷技術方面，中國發展的相當早，出版品也豐富，所以已有「書有未曾經我讀」之慨；倒是近代以前識字率較低，能夠口頌聖賢之道的「讀書人」要少些，但略識之無的平民百姓應當仍有可觀。

年鑑學派的理論興起之後，許多學者開始關注平民百姓的文化與生活，他們想什麼？做什麼？知道什麼？這一連串的問題，「日用類書」提供了最直接的答案。透過日用類書，我們除了可以認識當時的出版事業之外，也對平民百姓的知識與想法，也進一步的認識。

從南宋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已開始將一些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事物，編成「日用類書」，提供平民生活的指南，從類書的內容，可以看出平民生活的變化。吳蕙芳女士在王爾敏教授的指導下，以這個主題從事研究，將明清時期的「萬寶全書」做一比對、整理，使我們對這個時期平民百姓的生活內涵有較清楚的認識。

吳蕙芳女士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她的博士論文增刪後出版為此書，相信可以給未來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新闢一條蹊徑。

周惠民

民國90年5月24日

序

今日吳蕙芳博士新著即將出版問世，我於極端欣慰之餘，更要在道義上說明一些委婉關節，並在學術上的重要意義略作交代。

吳博士原曾在政大選讀我的課程，大約是在民國七十二年，不過，當時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任課老師，真正一直帶領和教導她的是戴玄之教授。蕙芳在攻讀碩士學位時，是由戴教授指導撰寫論文的；多年來全是由戴教授之諄諄施教，並帶領她進入中國社會史的研究領域。戴教授提攜門人子弟，賞識蕙芳的專志向學，進而鼓勵她更深一層地探究社會史論題。可惜中途未竟，戴教授不幸逝世，蕙芳遂失所指引，於博士班就讀時亦無所定其方針。其曾數次登門相訪，向我請益，並表達效列門牆之意。因戴教授為我河南鄉長，四十年交誼至深，且吾向承庇愛，久無寸報，故願勉力引領就道。蕙芳既已選定中國社會史為其專業，因是在此門類中令其研究明清時代的《萬寶全書》系列；一則循其向來所學舊路，

二則於社會史研究作重大開拓。

在學術研究重點來說，中國近代學術研治方向與方法，在二十世紀承西方學術之大量輸入，全面產生新轉向，開拓新門類，充實新內容，在此無暇涉論其它部門。其在十九世紀末葉，西方Sociology一門學問輸入，蔡爾康譯為「大同學」，嚴復譯為「群學」，並未引致世人注意。但一入二十世紀，被我國留日學生引進日本譯名為「社會學」，至此方見一門新學問在中國學術上立足。惟於中國社會史之研究，實起步於民國建立之後，且承革命史進展，附帶而展開祕密社會史之研討；創始先驅即革命領袖陶成章，蓋就革命史之需要而擴大至於祕密社會史與太平天國史。

就史學門類而言，孟森先生與蕭一山先生同是清史開山大師，然孟森先生精於政治史，蕭一山先生則長於社會文化史，故蕭先生亦兼長於祕密社會史與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戴玄之教授出於蕭先生門下，因是為研治中國社會史繼承人，並特長祕密宗教與祕密會社。戴教授先後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國立政治大學與香港珠海書院，專業從學者，可謂桃李滿門。蕙芳守師門之業，專志於社會史多年，吾既承接以代為領路，決當以其社會史為範圍，故而思考其就明清時代平民社會生活作研究對象，終而選定《萬寶全書》為一攻研論題。

我人讀書經驗所閱歷，無論前代先賢，即二十世紀以來

中國學界之任何賢達，實向來無人理會《萬寶全書》之評價，任何研究亦無干於此書之參考。直至二十年前余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始因研究前清鄉僻之小儒翁仕朝，方始引據《萬寶全書》。而在五年前寫成拙著《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方特予展示其重要價值。至於近年日本學者坂出祥伸之引用研究民間醫學，可謂是同時代而後我十餘年。且吾亦於四年多前引領蕙芳專志從事此書之研究。

吾人研究《萬寶全書》，當先知此書之特殊性質，是與絕大多數書籍完全不同，作為一項學問研究，正自有其特殊價值，亦必須確立正確認識。故願提示於此，以質証於學界同道，俾得識者之同情。

其一，《萬寶全書》並非高文典冊，抑且不入著作之林，大圖書館並不收藏。只是庶民間最低下之日用參考書籍，乃是隨用隨棄，無保存價值，向來不受學者重視，因是亦無人嘗試研究。

其二，《萬寶全書》不具著作身價，雖形制有其範式，而內容卻一直在變，如今亦可見自明代以來之版本不下六十餘種；但彼此內容不一，全無定本，始終保持其流變特色。但凡高文典冊，既成著作，即不能增減字句，而《萬寶全書》則大異於此。

其三，但凡著作，必出自創作，不可抄襲，而《萬寶全書》既是日用書籍，竟是百分之百抄襲他書，毫無創作；即

今各具不同版本，而彼此互抄，大多雷同。在世人所譏者，當指千篇一律。吾則與門人共約，吾等之研究問題，不怕千篇一律，而實更要萬篇一律。據吾研究方志之經驗，三十年來做學問，多在努力追尋萬篇一律。吾即使研究近代思想史，亦早特重千篇一律，不畏學界之任何挑戰。此亦吾傳授門人之一門家法。

其四，古書典雅深奧，文辭優美，引人入勝。而《萬寶全書》則不厭粗鄙庸俗，市井諺言，喜笑怒罵，行話切口，一概蓄納。不畏高人之鄙惡，但作民眾之共識；不求文辭巧妙，但要切實應用。

其五，《萬寶全書》雖是普及民間，因其重在生活應用，實極少用於宗教宣揚，未嘗轉載佛道經典；即令抄襲道藏之養生保健典籍，但只用於庶民之養衛身心，並未作宗旨宣述，因是保持純正之民生日用。

其六，《萬寶全書》被視為低下之小冊子，且全出自抄襲，故其作者亦俱出自市井文士之手，並非高明文家所願涉手。故作者多無學問地位，無烜赫之名；然在庶民群中，有廣大擁護者，仍被奉為一方學宗大師，具類書界高名，亦如命理家之平子，相術家之柳莊。

其七，《萬寶全書》雖是雜抄而成，而在其無意中保存前代佚失之故籍，果當是禮失而求諸野。若其中保存古琴樂譜、投壺各樣姿式圖像、明清雙陸牌式、蹴踘解說；多為罕見之

資料，得倖存於《萬寶全書》之中，此亦民間日用類書價值所在。

蕙芳好學深思，承接民間日用類書研究，十分努力用功。先後走訪北京、香港，並赴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等地蒐集資料，於不到四載之間，充分掌握要領而完成學位論文。撰寫此一重要論著，所循仍是戴玄之教授中國社會史道路，而於庶民通用之《萬寶全書》，則是領先他人，開出學術新里程碑；將此俗鄙史料，排進高深研究殿堂。自今而後，蕙芳勢將於民間日用類書大加開拓新路，成就嚴肅專長，而於明清社會文化史研究，亦將是一個生力軍。今值其著作將出版問世，內心十分欣慰。尤其對老友戴玄之教授而言，深慶他有一位重要的繼承人。

河南淮陽 王爾敏
民國 89 年 11 月 12 日
國父誕辰寫於南港

目 次

主編序	i	第二章 明清時期《萬寶全書》的演變	67
序	iii	第一節 《萬寶全書》的版本發展	67
目次	viii	第二節 《萬寶全書》的類目變化	100
圖例來源	xii	第三章 文化基礎的傳承	115
緒論	1	第一節 天文曆法	115
第一章 明清時期的民間日用類書	19	第二節 史地常識	130
第一節 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與演變	19	第三節 官秩律令	157
第二節 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的盛行	39	第四章 實用智能的學習	175
一、經濟的發展與影響	39	第一節 謀生技藝	175
二、社會的流動與變遷	47	一、耕作與飼畜	175
三、教育的普及與文化事業的發達	53	二、筭法與交易	202
四、文人的世俗化	59	第二節 玄理術數	220
		一、命理	220
		二、相法	236
		三、風水	262
		四、擇日	289
		五、雜占	303
		第三節 養生保健與醫療衛生	328
		一、保養	328

二、健身	340	第二節 娛樂活動	558
三、醫療	351	一、棋藝	558
四、祛病	368	二、骰戲	570
第五章 社交活動的歷鍊	379	三、牌術	583
第一節 日常禮儀與規範	379	四、技法	590
一、童訓教養	379	五、風月	612
二、四禮規範	391	結論	623
三、勸諭	419	附錄	641
第二節 人際交往與應世規矩	435	徵引書目	675
一、柬帖運用	435	後記	721
二、關禁契約	449		
三、呈結訴訟	470		
第六章 休閒興趣的培養	487		
第一節 怡情養性	488		
一、書法	488		
二、繪畫	497		
三、音樂	508		
四、詩文	519		
五、戲令	533		

圖例來源

- 圖2-1-1 《學海群玉》，萬曆35年序刊本，封面。
- 圖2-1-2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封面。
- 圖2-1-3 《萬寶全書》，崇禎元年刊本，卷9〈農桑門〉；卷16〈算法門〉。
- 圖3-2-1 《萬錦全書》，萬曆年間刊本，卷3〈人紀門〉，頁1上-下。
- 圖3-2-2 《學海群玉》，萬曆35年序刊本，卷2〈地輿門〉，頁1下-2上。
- 圖4-1-1 《五車拔錦》，萬曆25年序刊本，卷28〈農桑門〉，頁8下-9上。
- 圖4-1-2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37〈牧養門〉，頁7下-8上。
- 圖4-2-1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29〈星命門〉，頁9下-10上。
- 圖4-2-2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30〈相法門〉，頁12下-13上。
- 圖4-2-3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35〈地理門〉，頁6下-7上。
- 圖4-2-4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36〈剋擇門〉，頁6下-7上。
- 圖4-2-5 《學海群玉》，萬曆35年序刊本，卷21〈卜員門〉，頁18下-19上。
- 圖4-3-1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27〈護幼門〉，頁11下-12上。
- 圖4-3-2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41〈法病門〉，頁12下-13上。
- 圖5-1-1 《萬寶全書》，崇禎元年刊本，卷18〈勸諭門〉，頁1下-2上。
- 圖6-1-1 《萬用正宗分類學府全編》，萬曆35年刊本，卷26〈酒令門〉，頁1上。
- 圖6-1-2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20〈博戲門〉，頁12下-13上。
- 圖6-1-3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20〈博戲門〉，頁5下-6上。
- 圖6-2-1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10〈五譜門〉，頁14下-15上。
- 圖6-2-2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10〈五譜門〉，頁14下-15上。

緒論

頁4下-5上。

圖6-2-3 《學海群玉》，萬曆35年序刊本，卷13〈八譜門〉，
頁3下-4上。

圖6-2-4 《學海群玉》，萬曆35年序刊本，卷13〈八譜門〉，
頁14下-15上。

圖6-2-5 《三台萬用正宗》，萬曆27年刊本，卷13〈蹴踘門〉，
頁6下-7上。

圖6-2-6 《萬寶全書》，光緒24年刊本，續編卷5〈戲法門〉，
頁2下-3上。

近年來，由於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及馬克思史學傳統之重新受到重視，新史學成為六〇年代以來歐美史學發展主流，¹而在此趨勢下的社會史研究，亦呈現與以往截然不同的風貌；大致而言，此時的社會史研究對象從昔日之強調上層階級、統治者、精英分子等，轉而重視下層社會、一般民眾、乃至特種職業者；研究角度則自以往由上而下的「俯瞰」改為由下而上的「觀察」；研究內容亦偏向「還歷史以血肉」的社會生活史探討及「揭示社會精神面貌」的社會文化史研究；²影

¹ 羅鳳禮，〈當代美國史學狀況〉，見《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6月），頁88-93；李孝悌，〈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兼論中國史在這方面的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8期（民國78年9月），頁95-97。

² 有關新史學的特色及其影響，參見：林富士，〈Peter Burke編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新史學》，3卷2期（1992年6月），頁182-193；王心揚，〈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新史學》，6卷3期（1995年9月），頁155-183；梁其姿，〈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Evelyn Rawski 編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新史學》，創刊號（1990年3月），頁145。

響所及，海峽兩岸亦有倡導新社會史之研究，以擴大並豐富史學研究內涵，而研究成果，亦陸續出現。³

一般說來，社會生活史的研究歐美學界早有豐碩成果，且其探討方式有二，一是截取歷史上的一段時間，一個地區，然後逐步描述所定範圍中人們生活的各式形態，屬較靜態的研究方法；另一則是以人們生活中的某一特定問題為核心，設法從此一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之發展來探討其中之變化及其原因，屬較動態的研究方式；前者自十九世紀後半期已有研究成果出現，至今不絕，而後者產生時間較晚，基本上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其發展實與歐美近代思想與社會發展關係密切。⁴中文研究成果中，亦不乏社會生活史作品；其中，有以某一時間為研究斷限者，如宋德金的《金代的社會生活》、⁵馮爾康、常建華的《清人社會生活》、⁶李民主編的《殷商社

³ 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卷4期（1992年12月），頁95-115；常建華，〈中國社會史研究十年〉，《歷史研究》，1997年1期（1997年2月），頁164-183。

⁴ 有關西方社會生活史之研究，參見：蒲慕州，〈西方近年來的生活史研究〉，《新史學》，3卷4期（1992年12月），頁139-153；〈Paul Veyne編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 I〉，《新史學》，1卷2期（1990年6月），頁167-175。

⁵ 宋德金，〈金代的社會生活〉（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⁶ 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有關此書之介紹可見：陳支平，〈《清人社會生活》評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2期（1991年4月），頁99、97；鄭政誠，〈評介馮爾康等著《清人社會生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會生活史》，⁷乃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於198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下，發展的大型研究計畫「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十卷斷代史叢書的撰寫，包括宋鎮豪的《夏商社會生活史》、⁸史衛民的《元代社會生活史》、⁹朱瑞熙等人的《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¹⁰朱大渭等人的《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¹¹李斌成的《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等成果的先後完成；¹²也有以特定地區為研究範圍者，如分由黃新亞、李春棠、史衛民、陳寶良、趙世瑜等人執筆，湖南出版的一套專述唐、宋、元、明、清時代城市生活風貌的論著；¹³亦有將時間與地

21期（民國82年6月），頁221-228。

⁷ 李民主編，《殷商社會生活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

⁸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月，第2次印刷）。有關此書之介紹可見：宇都木章，〈評介宋鎮豪著《夏商社會生活史》〉，《東洋學報》，77卷1、2號（平成7年10月27日），頁135-142。

⁹ 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月）。

¹⁰ 朱瑞熙、張邦煒、劉復生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8月）。

¹¹ 朱大渭、劉馳、梁滿倉等，《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8月）。

¹² 李斌成，《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8月）。

¹³ 黃新亞，《消逝的太陽—唐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9月）；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9月）；史衛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9月）；陳寶良，《飄搖的傳統—明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9月）；趙世瑜，《肩

域均加以限定之研究，如錢杭、承載的《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等等。¹⁴然綜觀其內容，均屬前述第一種的研究方式，即在特定時間與空間背景下各式生活風貌的平面呈現。

再就社會文化史而言，新史學影響下的社會文化史著重對庶民思想、通俗文化的探討，而現有研究成果中其切入點往往是利用文學作品或宗教材料；前者如話本、小說、寶卷、戲曲等，後者則包括善書、經卷、陰陽文、功過格等，此不僅見諸歐美學術界，如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¹⁵ Cynthia J. Brokaw的*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¹⁶以及David Johnson、Andrew J. Nathan、Evelyn S. Rawski合編的*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¹⁴ 朽與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9月）。

¹⁵ 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

¹⁶ 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85)；此書中譯本見：〔美〕洪長泰著，董曉萍譯，《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7月）。

¹⁷ Cynthia J. Brokaw,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1)；此書中譯本見：〔美〕包筠雅著，張林譯，《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包筠雅，〈明末清初的善書與社會意識型態變遷的關係〉，《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6期（民國82年9月），頁30-40。

緒論

論文集等等；¹⁷亦見之於中文研究成果，如路應昆的《中國戲曲與社會諸色》、¹⁸郭英德的《元雜劇與元代社會》、¹⁹龐德新的《從話本及擬話本所見之宋代兩京市民生活》。²⁰此外，宋光宇之於善書研究、²¹喻松青之於經卷探討、²²車錫倫之於寶卷鑽研、²³柳存仁之於小說探究等；²⁴甚至，日本學界亦利用這些文學作品與宗教材料作研究，如酒井忠夫的《中國善書の研究》、²⁵澤田瑞穗的《增補寶卷の研究》、²⁶小川陽一的《明

¹⁷ David Johnson、Andrew J. Nathan、Evelyn S. Rawski e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民國76年10月，影印)；又有關此書之介紹可見：梁其姿，〈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Evelyn Rawski編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頁145-153。

¹⁸ 路應昆，〈中國戲曲與社會諸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¹⁹ 郭英德，〈元雜劇與元代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

²⁰ 龐德新，〈從話本及擬話本所見之宋代兩京市民生活〉（香港：龍門書店有限公司，1974年9月）。

²¹ 宋光宇，〈關於善書的研究及其展望〉，《新史學》，5卷4期（1994年12月），頁163-191。

²² 喻松青，〈民間祕密宗教經卷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83年9月）。

²³ 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民國86年5月）。

²⁴ 余英時，〈明清小說與民間文化—《和風堂新文集》序〉，《聯合文學》，12卷11期（1996年10月），頁14-26。

²⁵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不明出版地：國書刊行會，昭和47年12月8日）；此書之部分翻譯見：酒井忠夫著，蔡懋棠譯，〈明朝善書之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1卷2期（民國65年9月，再版），頁106-143；

代小說與善書）等。²⁷事實上，以此二種材料為基礎所形成的通俗文化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已有其一定貢獻，但能否更貼近民間生活原貌，更完整地呈現民間文化內涵，似可再加以討論。

由於新社會史的研究主題有所變化，連帶其研究方法與研究材料亦須有所突破，故筆者以為，民間社會生活與文化之探究，似應從民間生活上真正使用之材料——各式民間日用類書著手，透過其中之發展、演變及內容分析，或可自另一角度來觀察民間生活的實際情形，並明瞭其中蘊含之深意。

民間日用類書，在中國的發展頗盛且種類甚多，²⁸日本學界有稱之為日用百科全書、日用百科辭書，亦有稱為日用類書者。²⁹酒井忠夫曾將之分成七大類，即總括性的類書、為科

²⁷ 酒井忠夫，〈功過格的研究〉，見劉俊文主編，許洋主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9月），7卷，頁497-542。

²⁸ 澤田瑞穂，〈增補寶卷的研究〉，引自李孝悌，〈十七世紀以來的士大夫與民眾——研究回顧〉，《新史學》，4卷4期（1993年12月），頁103；此書之部分翻譯見：澤田瑞穂著，蔡懋棠譯，〈玉曆鈔傳〉，《臺灣風物》，26卷1期（民國65年3月），頁24、72-75。

²⁹ 小川陽一，〈明代小說與善書〉，《漢學研究》，6卷1期（民國77年6月），頁331-340。

²⁸ 蕭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下）〉，《文獻》，1985年1期（1985年1月13日），頁237-238。

²⁹ 如仁井田陞、寺田隆信稱之為日用百科全書，水野正明稱之為日用百科全書或日用百科辭書，酒井忠夫、小川陽一、坂出祥仲稱之為日用類書；工具書中的解釋則採日用類書一詞，見野口鐵郎、坂出祥仲、福井文雅

考而用的類書、書翰啓劄關係的類書、詩賦詞藻的類書、氏姓人物關係的類書、故事類的類書與幼學啓蒙的類書；³⁰事實上，此種分法並不完備，民間日用類書不僅此七種，還有為商業使用、³¹為農業生產應用的類書等等；³²此種書籍因為民間生活普遍使用，其史料價值之高可想而知。

而利用民間日用類書為研究材料，日本學界早開此風，此源於日本學者在戰前即大量搜集此種通俗用書，故日本國內藏有許多這類資料，便於學者研究。³³早在五〇年代時仁井田陞即撰文介紹此種史料且運用於法制史的研究，在〈元明時代の村の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一文中，他分兩階段地介紹了四十多種涉及契約文書、鄉約規範的日用類書及相關內容。

³⁰ 等編，《道教學典》（東京：平河出版社，1996年10月20日，初版2刷），頁478。

³¹ 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見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昭和33年3月），頁39-51。

³² 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3月）。

³³ 王毓瑚，〈中國農學書錄〉（北京：農業出版社，1979年9月，第2次印刷）。

³³ 日本學者在戰前即有計畫地蒐購明清時期的民間日用類書，但現在日本國內此種書籍明刊本多於清刊本，蓋因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東京被轟炸使清刊本大量毀損所致；見仁井田陞，〈元明時代の村の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一）——日用百科全書の類二十種の中から一〉，《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3冊（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會，1962年3月20日），頁747。

這些史料部分來自專科性的民間日用類書，然其中亦不乏綜合性民間日用類書中相關門類的內容採用；而在此文之前，他已運用這些資料完成若干有關元明時代公私律法的研究。³⁴惟此時仁井田氏並不清楚這種資料的淵源、性質及分類，僅因其內載有許多民間律法方面的珍貴內容，故特別予以重視。

真正對民間日用類書有較完整而全面性介紹的學者首推酒井忠夫，在〈元明時代の日用類書とその教育史的意義〉一文中，首先指出：民間日用類書的普遍出現代表著此時期庶民教育的普及與庶民文化的發展；次年的〈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一文中，更概述了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種類、其在明代普遍發展的原因及其傳承意義。酒井氏以為：民間日用類書應源於南宋，在明代普遍發展實與當時的社會、文化思想的變遷有關，而其種類應分為七項；為逐一介紹他所掌握的各式民間日用類書資料，在長達一百二十八頁的單篇文章中，有二分之一的篇幅即是對五十餘種不同的民間日用類書資料加以說明。同時，他強調這些民間日用類書傳承

³⁴ 仁井田陞，〈元明時代の村の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一）一日用百科全書の類二十種の中から一〉，頁741-789；〈元明時代の村の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二）新たに調査した日用百科全書の類二十餘種によって一〉，頁790-829。其中，曾言及著者引用元明時期日用類書資料而產生之其它研究成果，參見上文，頁746，註1及頁748，註6。又見酒井忠夫，〈序言—日用類書と仁井田陞博士〉，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日用類書集成I—五車拔錦（一）》（東京：汲古書院，平成11年9月），頁2。

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與儒家、幼學傳統的持續。³⁵酒井忠夫的研究最主要貢獻在於，對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發展有了概括性地了解，且將此種史料賦予教育史的意義；但其研究仍屬初探性質，許多部分並未清楚交代；例如：明代民間日用類書的普遍發展是如何與當時的社會、文化思想變遷有關的？南宋是民間日用類書發展之源，然其與民間日用類書普遍發展的明代後期，中間的演變情形如何？且酒井忠夫的研究核心，主要是強調這些資料在庶民教育史上的意義，因此，引用的民間日用類書材料多屬幼學童蒙、啓劄翰墨、故事、科舉考試等類的專科性民間日用類書，文中若採用到綜合性民間日用類書時，僅選擇相關部分介紹，並視之為教育性質的專科性民間日用類書；亦即，酒井氏與仁井田氏一樣，並未將專科性民間日用類書與綜合性民間日用類書加以區分。

六〇、七〇年代，日本學者已將民間日用類書應用於商業史的研究。寺田隆信在〈明清時代の商業書について〉一文，及《山西商人の研究》一書中的第六章〈商業書にみる商人と商業〉，介紹了六種商業用的專科性民間日用類書及一種綜合性民間日用類書中的商業內容，其並利用這些資料探討山西

³⁵ 酒井忠夫，〈元明時代の日用類書とその教育史的意義〉，《日本の教育史學》，1號（1958年），頁67-94；〈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頁25-154。

商人的發展情形。³⁶而森田明、斯波義信則有關於《商賈便覽》、《新刻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等商業書介紹的專文發表。³⁷

到了八〇、九〇年代，民間日用類書的利用除了持續以往商業史的研究，如水野正明的〈「新安原板士商類要」について〉一文，對明清時代幾部重要商業書間的傳承關係予以釐清；且針對《土商類要》一書的內容加以介紹說明，尤其著重闡釋當時的經營理論。³⁸也有學者進一步地將這些經商貿易用民間日用類書內的各式地理相關資料再專門列成路程書一種，予以深入探究，如山根幸夫在〈明代の路程書について〉一文中率先提出路程書與商業書不同，兩者應予區隔使用的

³⁶ 寺田隆信，〈明清時代の商業書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20期（昭和44年10月20日），頁111-126；〈商業書にみる商人と商業〉，《山西商人の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業資本》（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内東洋史研究會，1972年11月30日），頁197-324；亦可參考中譯本，寺田隆信著，張正明等譯，《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有關此書之介紹可見：楊聯陞，〈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評介〉，《食貨》，3卷2期（民國62年5月15日），頁36-43。

³⁷ 森田明，〈「商賈便覽」について—清代の商品流通に関する覺書〉，《福岡大學研究所報》，16期（1972年），頁1-28。斯波義信，〈「新刻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について〉，《東洋學論集》（京都：朋友書店，昭和54年12月1日），頁903-918。

³⁸ 水野正明，〈「新安原板士商類要」について〉，《東方學》，60輯（1980年7月），頁96-117。

觀念；³⁹而谷井俊仁在〈路程書の時代〉一文中更是運用《統路程圖記》、《土商類要》、《土商要覽》等書中有關路程刊載之資料，描繪明代後期民間交通情形。⁴⁰同時，民間日用類書的利用還跨入了文學、醫學及數學的研究領域。小川陽一的著作《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致力於以民間日用類書證實明清小說中的虛擬世界有其真實社會的內涵，並由此深入了解小說中作者之筆法技巧、構思布局及蘊含深意。⁴¹本田精一先自童蒙書角度注意到民間用書，而有〈《兔園策》考—村書の研究〉的考證文；接著，又自幼學算術書角度運用民間日用類書資料，〈宋元明代における兒童算術教育〉一文旨在說明當時的兒童數學教育情況；其後，再以〈『三台萬用正宗』算法門と商業算術〉一文比較數種算學專門著作與《三台萬用正宗》這套綜合性民間日用類書中算法門內容的異同。⁴²而坂出祥伸則以〈明代「日用類書」醫學門について〉

³⁹ 山根幸夫，〈明代の路程書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22號（1994年4月），頁9-24。

⁴⁰ 谷井俊仁，〈路程書の時代〉，見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年3月31日），頁415-455。

⁴¹ 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5年10月10日）；其中，曾言及著者引用明代日用類書資料而產生之其它研究成果十餘篇，頁403-405；有關此書之介紹可見：吳蕙芳，〈評介小川陽一著《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期（1997年12月），頁253-257。

⁴² 本田精一，〈《兔園策》考—村書の研究〉，《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1號（1993年1月），頁65-101；〈宋元明代における兒童算術教育〉，

一文，專門介紹數種明代綜合性民間日用類書中醫學部分的內容。⁴³

在日本學者持續運用民間日用類書資料作研究時，西方學界亦有人撰文利用這類資料，並肯定這些民間史料的價值與意義。七〇年代的Evelyn Sakakida Rawski在研究清代中國的教育及大眾識字問題時，已使用到部分民間日用類書資料。⁴⁴而八〇年代的James Hayes在“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一文中，針對香港新界地區的研究指出，要了解通俗文化的重要材料包括家譜、曆書、幼學教育書、書信指南、契約、日用全書、卜卦書等等；這些書寫資料的普遍流傳、長期存在，且一再地被翻印，除了被評估是某種程度的讀寫能力在此一社會中之發展外，更可顯現中國文化的繼承性與一致性。⁴⁵到了九〇年代，Shang Wei在“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the Encyclopedias

《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2號（1994年1月），頁37-72；〈『三台萬用正宗』算法門と商業算術〉，《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3號（1995年1月），頁87-125。

⁴³ 坂出祥伸，〈明代「日用類書」醫學門について〉，《文學論集》，47卷3號（1998年），頁1-16。

⁴⁴ Evelyn Sakakida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⁴⁵ James Hayes, “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見David Johnson、Andrew J. Nathan、Evelyn S. Rawski e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頁75-111。

for Daily Use”一文中，則以小說《金瓶梅詞話》與當時流通的民間日用類書相比對，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及其生活場景，在相當程度上是民間日用類書文化活動的化身，並揭示小說的敘述話語與民間日用類書的版式設計間的對應關係。⁴⁶

中文作品中亦不乏運用民間日用類書的成果出現；如大陸學界的韓大成、楊正泰較早應用於交通史兼及商業史的研究：⁴⁷陳學文則專注於商業史的探討，在《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一書中，除介紹六種經商貿易用的專科性民間日用類書外，同時指出這些商業性民間日用類書在經商行為和心態、商品流通、水運業的發展等方面之研究成果。⁴⁸而最早將之應用於社會生活史與社會文化史領域內的學者則是

⁴⁶ Shang Wei,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the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辦，1999年7月16-17日），32頁。

⁴⁷ 韓大成，〈明代微商在交通與商業史上的重要貢獻〉，《史學月刊》，4期（1988年7月），頁35-43；〈明代交通運輸散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期（1998年），頁93-103。楊正泰，〈現存最早的商旅交通指南〉，《歷史地理》，2輯（1982年11月），頁158；〈略論明清時期商編路程圖記〉，《歷史地理》，5輯（1987年5月），頁273-277；〈明代國內交通路線初探〉，《歷史地理》，7輯（1990年6月），頁96-108。

⁴⁸ 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著者亦有其它單篇文章的發表，如〈明代一部商賈之教程、行旅之指南—陶承慶《新刻京本華夷風物商程一覽》評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1996年3月），頁86-93。